



古文字视野下的《说文解字》*

李守奎

摘要:《说文》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是当今一大课题。《说文》是汉代汉字研究之集大成者,是传统汉字学创始之作,历史上利用与研究都很充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在当今古文字视野下,不仅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说文》的成就与不足,也能够更充分、广泛地利用《说文》学习和研究古文字。《说文》是汉代所谓“古文”的汇编,要特别关注重文之外字头中的古文字。从古文字角度研究《说文》,是突破传统,取得系统性创新的重要途径。利用《说文》学习古文字和利用《说文》研究古文字,不能只盯着《说文》的不足,要充分发挥其价值,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关键词:古文字;《说文解字》;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5-0092-11

《说文解字》(下文简称为《说文》)是一部不朽的经典,是汉代所见先秦“古文字”与秦汉篆文的材料大全,是最早的古文字编;《说文》开启了汉字阐释的文字学道路,是最早的全面系统的汉字阐释专著;《说文》是最早的篆文部首检索字典,创立了部首编列的字典范式。自其诞生以来,传统文字研究基本上在此理论方法框架下展开,这种绝对主流的学术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

随着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大量发现和西学东渐,传统小学之中的文字之学发生了分化:重视考证的古文字学、重视理论的文字学、重视实用的应用文字学,还有沿袭传统重视阐释的《说文》学。站在不同的角度回首看《说文》,既能看到其价值,又能发现其不足,对《说文》的评价容易走向两极:贬之者痛斥许慎之荒谬,扬之者盛赞《说文》之精微。在古文字学与现代文字学创立的初期,指摘《说文》,对推翻偶像有一定的意义,在古文字学学科化已久的今天,深入了解

《说文》并充分利用《说文》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说文》中的“古文字”

汉代实际应用的文字是隶书和草书,篆书只在铭刻、印章、幡信等特殊场合使用。《说文》的研究对象是篆文和当时能够见到的古文字。“古文字”这个概念是汉代人提出来的,《汉书·郊祀志下》:“(宣帝时)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臣愚不足以迹古文。”^[1]这里“古文字”与“古文”并见,是指当时能够见到的秦文字之外的各种先秦文字。秦文字大家都认识,不在当时的“古文字”之列。

今天我们所说的广义的古文字,不仅包括秦汉篆文,也包括秦汉隶书和汉代草书。

许慎的《说文》把当时通行的隶书、草书都排除在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三类: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出土文献中的“古文”^①、传抄古文字“籀文”和当时还在一定场合应用的篆文。其体例

收稿日期:2021-12-03

*基金项目: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项目“汉字文化传承与传播基地建设”(G1814)、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9年度重点项目“汉字阐释的理论构建与汉字文化普及”(ZDI135-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守奎,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主要从事语言文字学、出土文献研究。

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篆文”作为字头，把古文和籀文作为重文附在其后。这就造成一种误解，让很多人认为《说文》的字头是小篆，重文是古文和籀文等，低估了《说文》中“古文字”的数量。

学者很早就知道《说文》字头中也有古文字，如果所附重文是“篆文”，其字头不是古文就是籀文，段玉裁称之为“变例”。段玉裁依靠《说文》内证和文献旁证深入研究一些变例中的“古文”，经典范例就是对“上”字古文字头的订改。

《说文》(大徐本):“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上之属皆从上。𠄎,篆文上。”小徐本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二,高也。此古文上。

古文上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云:“从古文上”,可以证古文本作二,篆作上。各本误以上为古文,则不得不改篆文之上为𠄎。而用上为部首,使下文从二之字皆无所统。“示”次于二之旨亦晦矣。今正上为二,𠄎为上,观者勿疑怪,可也。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此独先举古文,后言小篆作某,变例也。以其属皆从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

指事也。

凡指事之文绝少,故显白言之。不于“一”下言之者,一之为指事,不待言也。象形者,实有其物,日月是也。指事者,不泥其物而言其事,上丁是也。天地为形,天在上,地在下;地在上,天在下,则皆为事。

凡二之属皆从二。

时掌、时亮二切。古音第十部。

上,篆文上。

谓李斯小篆也。今各本篆作𠄎,后人所改。^{[2]1-2}

就这一个字的注释而言,段玉裁有杰出的贡献。

第一,将字头古文“上”改为“二”完全正确。段氏的依据主要是《说文》的内证:一是许慎自己明确说“二”为古文上,是“帝”“示”等字所从。二是字头如果是“上”,部内“帝”“旁”等字无所从,与《说文》“分别部居”的体例相悖。三是字头如果是“上”,部首“一”“上”“示”“三”的顺序与《说文》部首之间“据形系联”的体例相

悖。这些理由非常充分,改为“二”之后,一切矛盾都涣然冰释。

第二,认识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有正例和变例。

第三,补充了注音,包括中古音和上古音。段玉裁的古音研究成就卓越,《说文解字注》中不仅利用古音知识解决古书很多释读的问题,而且给每个被注释字加注了古音。

从文献到文献,充分利用《说文》的体例以及版本、引文、字书等不同来源异文校勘字形,从文献语言的角度解释词义,运用古音学知识因声求义。清人在这方面成就显著,无出其右。

利用文献证据进行推理解决字形问题,常常是非参半。段玉裁改篆并非都是如此成功,对“上”字的更改,同样是非参半。字头古文“上”改为“二”不仅逻辑合理,也得到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实证。但是把大小徐本所附篆文“𠄎”改为“上”,是典型的以不误为误,被古文字材料证实完全错误。依靠《说文》内证,能够解决字形中的一些问题,但风险很大。段玉裁的成就可以说是传统文字学的巅峰,但改“上”字字头得到完全认同,还是因为被古文字证实。今天在古文字研究的视野下,我们即使没有段玉裁那么大的学问,对《说文》中这类问题也比段玉裁看得清晰,看得全面。

《说文》中自称14篇9353字,重文1163个。书中标明籀文225字,古文510字。段玉裁等学者认为古文、籀文大都与小篆相合,不相合的作为重文附录。但九千多字头中究竟有多少是古文和籀文,依旧无法判断。要想证明《说文》中有多少“古文字”,只有通过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才能验证。

从古文字的角度看《说文》,这是许慎当时能见到的古文字总汇。古文字有如下形式存在:

第一,与篆文形体相合,古文字无需重出。

第二,重文中的古文、籀文、奇字等。

第三,因重文附有篆文而可识别的“变例”中的古文字。

第四,只见于古文或籀文,没有相应的篆文,这类古文或籀文只能以字头的形式出现。

前三类情况久为大家所熟知,有学者对《说文》正、变例中的古文字做过详细的统计,研究比较充分。在古文字视野下,第四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说文解字》中有相当一

部分在文献语言中从来没有被使用过,这些形、音、义来源不明的字,大都是汉代人所见到的“古文字”。这些古文字后世被误解为小篆,在字体上也相应地“小篆化”,愈发真假难辨。这类“古文字”的甄别与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说文》中的老大难问题,而且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说文》的体例与价值。

二、从古文字的角度研究《说文》

《说文》是汉字学的鼻祖,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材料是当时能见到的古文、籀文和还在一定范围内应用的篆文;理论是“六书”;目的除了释读文字、阐释构形,还常常超出文字学之外。宋代之后的金石学虽然取得一些古文字研究的成绩,但仅仅是《说文》之补充。自从古文字学从传统文字学分化出来之后,在理论、方法上取得突破,取得大量科学可信的研究成果。对于《说文》,可以把它放在古文字材料的背景下去观察,审视其材料来源,理清文字之间的关系,理解许慎的意图,祛除其中的错误。下面通过“卯”“省”“土”三个具体的例子,分别从论据审核、关系系联、构形溯源三个角度看一看古文字视野下对《说文》的认识。

首先,以“卯”字为例,看如何从材料来源上加以审视、理解与判断。

古代韵书、字书中“卯”字异体作“𠂔”,这个字形源自《说文》篆文:

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凡卯之属皆从卯。𠂔,古文卯。

《说文》对于干支字的释义,主要是阴阳五行思想的表达,与语言文字的本体没有太大关系,这里可以暂时不去深究。对于字形,《说文》说是“象开门之形”。其思路是:十二地支与十二月相配,“卯”对应的是二月,二月是春,春天万物冒地而出,“卯”的读音源自“冒”,即冒出。冒出得有个出口,出口是“门”,所以“卯”的字形就像“门”。这是一套自成逻辑体系的阐释。如果把它放在古文字视野下观察,不仅会发现其错误,还能发现很多值得思索的文字现象。

图1“卯”字字谱中字形分为上、中、下三行。上行自甲骨文以来一直到今天,字形一脉相承,而且是各个时代的通用文字。许慎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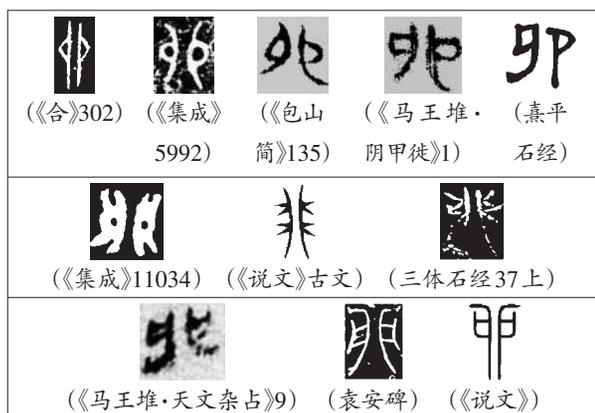


图1 “卯”字字谱^②

代,不论是篆书还是隶书,这种形体也是最常用的写法。中行显示《说文》古文确有依据,战国齐文字可以证实,充分显示了《说文》的资料价值。下行字形最早见于西汉时期,是受隶书字体的系统制约,把弧形笔画分解为隶书的横与折,这是隶变。这种写法影响到汉代篆文,与许慎同一时期的袁安,其墓碑文是篆文,但“卯”字的写法显然是汉隶的“篆化”,学者就把它想象成两扇门形。《说文》篆文就是这种字形的进一步改变。所谓的“象开门之形”,是就这种特殊的字形而言。

把《说文》“卯”字的阐释放在古文字视野下观察,我们会发现:

第一,许慎取材的特点。作者放弃自古及今普遍应用的字形,选择罕见字形并加以改造,目的是为了表达汉代的经学思想。

第二,汉代篆文受隶书的影响,可以从“篆文隶变”和“隶书篆化”两个角度观察。小篆隶变是普遍的现象,汉代学者把隶书改造成小篆也不是个例。

第三,“《说文》篆文”不同于《说文》所说的秦人“小篆”,其来源复杂,其中有一部分是汉代才出现的独特字形。

第四,《说文》篆文“卯”这种糅合了篆书的弧形与隶书横折写法的字形,目前仅见于《说文》,很可能在当时的实际应用中并不存在。楷书系统中的“卯”“畱(留)”“柳(柳)”等应该产生于汉代之后。

其次,以“省”字为例,从文字的历史发展角度重新审视《说文》中的字际关系。

在《说文》中,“省”与“眚”是字形、字义各不相同的两个字:

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声。(所景切)
 眚，视也。从眉省，从中。𠄎，古文从少
 从囧。(所景切)

我们观察一下图2列出的出土文献中“省”与“眚”的渊源与用法：



图2 出土文献中的“省”与“眚”^③

图2所示字形在出土文献中的用法如下：

眚：《合》5116：“丁酉卜，古贞：王眚(往)眚(省)从西，大……”

眚：小臣俞尊：“丁巳，王眚(省)𠄎。”

眚：𠄎钟：“王肇迺眚(省)文武勤疆土。”

眚：石鼓文·盩车：“眚(省)车𠄎(载)衍(行)，[戎]徒如章。”

眚：《郭店·语丛二》简8：“𠄎(爰)生于眚(省一性)，𠄎(亲)生于𠄎(爰)。”

眚：《上博一·缙衣》简7：“𠄎(以)邵(昭)百眚(省一姓)。”

眚：《睡虎地·杂抄》简22+23：“赋岁红(功)，未取眚(省)而亡之，及弗备，𠄎其曹长一盾。”

省：《马王堆帛书·周易》8：“无孟(妄)，元亨，利贞。非(匪)正有省(眚)，不利有攸往。”

省：元始钁：“铜钁容六升，重廿九斤，元始四年考工工礼造，守佐众、守令史由、兼掾荆主、左丞平、守令禁省。”

第一，从字形的演变过程和所记录的词义两个方面，完全可以确定，“省”与“眚”是“𠄎”的分化。

商与西周时期有的“𠄎”，下“目”上“中”，用法是省视之“省”。此形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中间加点，下面加横，“中”逐渐音化为“生”；一条是“中”下面一横逐渐倾斜，《说文》小篆进一步篆化屈曲，并被误解为眉形。在隶书

中，“中”的弧形笔画被进一步分解，写成与“少”一样的同形部件。从用法上看，不论写作什么，大都用作省视，应当是一字异体。古文字中并没有形成“省”与“眚”用法上的对立。用作目病之“眚”与借作性情之“性”的“眚”都是这个字的假借用法。

第二，理清了“省”“眚”二字的渊源与彼此关系，还需要对“省”字的构形理据加以解释。

《说文》阐释“省”字，除了眉形是误解外，“目”与“中”两个字符的识别都是正确的。从“目”从“中”为什么就是省视的“省”？这就需要从文字构形的系统性和古代文化等多个角度加以阐释。

在《说文》540部中，收字超过400的只有“艸”“木”“水”三部。与“艸”相关的部首有4个，都在卷一，各部收字情况是：中部7字，艸部445字，蓐部2字，𠄎部4字，合计458字。与“木”相关的有：木部421字，林部9字，合计430字。艸、木相关的文字数量这么多，并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我们祖先对植物观察如此细致是基于现实的需求。“省”与“相”是我们先祖仔细观察植物的真实写照：

省，𠄎(《合》5116) 相，𠄎(《合》18793)

“省”是仔细观察“中”，“中”就是“艸(草)”，泛指草本植物。“相”是仔细观察木，木泛指木本植物。哪种植物可以食用，哪种植物有毒，哪种植物具有其他什么用途，这直接关系到人类生死与日常生活。“省”“相”二字构意相同，是上古文化的真实反映。至于结构有上下与左右的不同，那是受表层结构区别度与均衡律的制约。

第三，“省”在《唐韵》中都是“所景切”，《广韵》中又音“息井切”，现代汉语中反省、省略中的“省”，读音也不同。这种语音分化起于何时？会不会与字形的变形音化和字形分化有一定的关系，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后，以“土”字为例，看不同来源的构形部件如何混讹同形。

在古文字视野下，我们可以对一些常用字的构形分析达到新的高度。汉字中一些来源古老、结构简单的字，往往构形不明。以“土”及以“土”为字符构形的文字为例，可以看到，古文字中“土”“圭”“牡”“土”来源不同，形音义有别，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体相近，彼此混讹，导

致汉字中的“土”或部件“土”出现多个来源。

我们先来看一下《说文》对上述诸字的阐释：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

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珪。古文圭从玉。

牡，畜父也。从牛，土声。

验之古文字，字形皆有依据，释义皆不可信。就以“牡”字为例，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土声”存在问题。段玉裁就敏锐地指出“土”与“牡”声韵不合：

牡，畜父也。从牛，土声。按：土声，求之迭韵双声皆非是。盖当是从土。取土为水牡之意。或曰土当作士。士者，夫也。之韵尤韵合音最近。从士则为会意兼形声。莫厚切。古音在三部。^{[2]50}

严可均就上了《说文》的当，把“牡”字兼收入幽部和鱼部。而高本汉、王力等学者就没有受这个假形声字的影响，果断将其归入幽部。但是“牡”何以从“土”，段玉裁给出两种推测，但并没有形成共识。在古文字视野下，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更加明晰了。

“土”有四个来源，分别是：土、圭、牡、土。

土1——斧钺形。

𡗗(土上卣《集成》5421) 𡗘(《集成》5985)

𡗙(秦公簋《集成》4315)

林沅有王、土同源说^[3]，二者都是以斧钺象征生杀予夺之权位。《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伪孔传曰：“士，理官也。”理官也就是后代的法官。西周中期以后，“土”简化为两横一竖。西周晚期以后，“土”也开始简化为两横一竖，两个字的区别度很小。

土2——圭，从玉器形到二土，再到二土。

《说文》：“吉，善也。从土、口。”甲骨文的“吉”字有下列三种形体：

第一种：𡗗(《合》225) 𡗘(《合》27382)

第二种：𡗙(《合》30061) 𡗚(敌簋《集成》3827)

第三种：𡗛(《合》31047) 𡗜(即簋《集成》4250)

这三种形体中第二种是象形的“土”，第三

种是简化的“土”。第三种是《说文》“吉”的直接源头。这里重点讨论第一种字形。

目前学术界已经确认第一种“吉”字上部所从，是“圭”的象形初文^[4]。西周之后，变为两个“土”，战国文字绝大多数保留了两个“土”的写法，尤其是楚文字，“土”的特征更加明显，即使加上意符“玉”，依旧保持两横等长的特征。

圭：𡗗(《合》1950正) 𡗘(《合》15147) 𡗙(子圭女爵《集成》8757)

𡗚(师遽方彝《集成》9897.1) 𡗛(《上博简二·鲁邦大旱》3)

珪：𡗜(《清华简一》·金滕5) 𡗝(《清华简二·系年》128) 𡗞(《郭店简·缁衣》35) 珪(《说文》古文)

在西周晚期，有的“圭”所从的“土”已经与“土”混讹：

𡗗(多友鼎《集成》2835)——𡗘(秦驷玉版)——圭(《说文》)

“圭”由象形，变为两个“土”，又变为两个“土”。从来源上说，“吉”字中最起码有一部分所从的“土”是“圭”的象形，商代以后就被“土”形吞并了。

土3——牡，雄性生殖器。

“牡”与“土”在甲骨文中有所别。

表1 甲骨文中的“牡”与“土”

牡	牡	牡	牡	牡	牡	牡
《合》3140	《合》14271	《合》2303	《合》1371	《花东》98	《花东》198	《合》8233

周忠兵指出上列字形中的“土”形，就是“牡”的初文，《合》28195卜辞占卜所入马，其中的“𡗗”就是“牡”的初文，后来讹变为“土”^[4]。

表1中间的“𡗗”字义为雄猪，就是“家”字的音符，突出腹下雄性生殖器，其他字都是表示雄性动物“牡”。

“牡”的初文与“土”混讹的时间很早。学者多认为“土”字像土块立于地上，团块线条化就成了“土”，与“牡”的象形初文同形了。这种情况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发生。

甲骨文“土”字的几类典型写法：

𡗗(《合》21103) 𡗘(《合》6057正)

𡗙(《合》6059) 𡗚(《合》36404)

但在下列文字构形中“土”已经与“牡”混

讹：

 (《合》3227)  (《合》30272)

 (《合》36481 正)  (《合》34071)

单独使用的“土”有时也完全与“牡”的象形初文同形：

《合》36975：东土受禾；南土受禾，吉；西土受禾，吉；北土受禾，吉；其词例非常明确，其中的“土”字分别作：、、、。

“牡”的初文繁化，“土”的初文简化，殊途同归，最后都变成了“土”形。许慎可能没见过这么多材料，强解字形，就出现了“土声”的谬解，也给古音学挖了一个坑。

“牡”的初文“上”讹变为“土”，残存在“牡”字中；“牡”的初文也变成“土”，古文字中也留下一些痕迹。《郭店简·老子甲》简34：“未智（知）牝戊（牡）之倉（合）而怒，精之至也。”今本《老子》第五十五章作：“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

“媵”字上部从“土”，下部不明，可能是“肉（月）”的讹书^⑦。今本与此字相对应的“媵”见于《说文》新附“媵，赤子阴也”，也就是婴儿的生殖器。其所从“土”，应该是当时人们还能将“土”与生殖器联系起来。

从“土”的字与男性生殖器有关。《说文》：“毒，人无行也。从土从毋。贾侍中说：秦始皇母与嫪毐淫，坐诛，故世骂淫曰嫪毐。读若媵。”据史书记载，嫪毐又被称为“大阴人”，“毒”不是人名，而是生殖器特征，所以字从“土”。

《说文》土部共四字：“土”“壻”“壮”“壘”，土的常用义是男人，壻是女人所嫁的男人，壮是男人之美，壘是男人之舞，都与男性有关，所从的土的源头很可能就是“牡”。

土4——土。

不仅“牡”的表意字和“圭”的表意字都讹变成了“土”，又与“土”混讹，“土”与“土”因为区别度太小，无论是单字还是构形中的部件都彼此混讹：

土： (师颍簋《集成》4312)  (《包山简》213)

土： (克钟《集成》208)  (诅楚文·巫咸)

 (嘉祥画像石题记)^[5]

《说文》：“在，存也。从土，才声。”

 (大孟鼎《集成》2837)—— (中山王器《集成》9735)

《说文》“在”中的“土”为“土”之讹，古文字

中是个双音符字。

表2是“土”“圭”“牡”“土”交错混讹表。

最晚到春秋时期，“土”“土”“牡”和“圭”中的“土”都线条化为两横上面一竖，这种形体依靠笔画的长短作为区别特征，可能会形成四种区别形式：

第一，横画上短下长： (《清华简一·皇门》6)

第二，横画上长下短： (秦公簋《集成》4315)

第三，横画等长： (子璋钟《集成》113)

第四，竖画不穿透上部的横画： (《包山简》80)

“土”“圭”“牡”“土”理论上说可以与上述四种区别方式相对应彼此区分开来，但文字系统的形成不是由文字学家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应用过程中自然生成、不断调整形成的，文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循已有的或可能的区别形式，只区别了“土”与“土”，其他形式不区别意义，形成彼此互补的异体字。来源完全不同的“圭”与“牡”或者合流于“土”，或者合流于“土”，这样最终会导致：

“土”有四个来源：土、圭、土、牡。

“圭”有三个来源：圭、土、土。

“土”有四个来源：土、圭、土、牡。

“牡”被“土”与“土”吞并。

这些文字如果不经过历史溯源，依据已经记号化了的小篆进行构形理据的阐释，除了借题发挥表达思想之外，不可能在文字学方面接近事实的真相。在古文字视野下，我们不仅质疑《说文》之不可信，更要以材料证明具体哪些地方不可信。

对于《说文》中的每一个汉字在文字系统中分辨区别特征、探寻演变规律、区分讹混同形、剔除阐释谬误，会使汉字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

通过把《说文》中的“土”放置在古文字视野下仔细观察、分析，不仅对“土”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且彼此纠缠的文字构形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表意字，像斧钺形。象征掌生杀之权力，意为司法职官等。简化为“土”成为记号。构形中或讹变为“土”，例如“在”字。

“”：表意字，象圭形。与“土”形体相近，被“土”吞并成为同形字。为了与“土”区别，变为双“土”，后来“土”又讹变为双“土”。

表2 “士”“圭”“壮”“土”交错混讹表

	商代	西周春秋	战国	秦汉
圭	 (《合》1950 正)  (《集成》8757)	 (《集成》9897)  (《集成》2841)  (《集成》2835)	 (《诅楚文·澍渊》)  (《上博二·鲁》3)  (《清华简一·金》5)  (《清华简二·系》128)  (《说文》古文)	 (《秦印文字汇编》260 页)  (《武威医简 70》)  (《说文》篆文)
土	 (《合》6057 正)  (《合》6059)  (《合》36975)	 (《集成》2837)  (《集成》2832)  (《集成》4312)	 (《包山简》213)  (《清华简一·皇》6)	 (《里耶秦简》8-1146) [®]  (《马王堆·老子乙》27)
士		 (《集成》208)	 (《诅楚文·巫咸》)	 (《马王堆·老子乙》4)
		 (《集成》113)  (《集成》4315)	 (《嘉祥画像石题记》)  (《包山简》80)	
壮	 (《合》28195)	 (《子犯编钟·铭图》 [®] 15211)“驻(壮)”字 偏旁	 (《郭店·老子甲》34) “股”字偏旁	 (《马王堆·老子乙》17)  (《说文》)

“𡗗”：表意字，象地上置土块形。简化为“土”成为记号字，与“圭”的初文、“牡”的初文、“士”或有混讹。

“𡗗”：表意字，像雄性生殖器。在文字构形中或讹变为“士”，例如“毒”；“媮”之战国文字写法；“壻”“壮”等；或讹变为“土”，例如“牡”“在”。

所谓“合理的解释”是相对的。我们比许慎见到的材料多，理论方法经过近两千年的进步，理所当然要合理一些。即使相对合理，也有并不完全合理的地方，例如：甲骨文中“吉”字有从“圭”、从“土”两种形体，西周文字从两个“土”的“圭”显然源自商代。也就是说，商代“圭”与“土”就已经混讹同形。但无论是所象器形还是字形，二者都相去甚远，混讹同形过程中字形还有缺环，还需要作为一个问题悬置^⑩。

三、利用《说文》学习古文字

《说文解字》收录了汉代学者所能识别的大部分“古文字”。在古文字大发现的今天，掌握了《说文》中的常用字，古文字中的大部分文字可以快速识别。

先要掌握《说文》中的常用字。汉字古今相承，表意文字系统没有根本变化，常用字与常用词结合稳固，文本识读最重要的就是常用字。例如商代的小臣俞尊（见图3），共四行27字，3个疑难字都是专名，其他文字在熟悉《说文》之后，大都可以释读，铭文即可通读。



图3 《集成》5990

丁巳王省𡗗(𡗗?)𡗗，

王赐小臣俞𡗗贝。

隹王来正人方，隹

王十祀又五。彤日。

铭文四行五句，行款比较整齐，前两句叙述

王赏赐贝的时日、地点。后面是大事和纪年。铭文中的王、小臣、来、正、人、方、祀、又、五、日等字没有学习过古文字的人大都能够识别出来，读过《说文》之后，常用字释读几乎没有太大难度。至于其中的几个疑难字，没有充分的材料，古文字学家也难以考定，可以留待将来研究。

《说文》以小篆为桥梁沟通古今，作为一种学习方法是合理的，尤其是对于汉代人来说，篆文还在一定场合应用，读书人普遍认识小篆，以小篆沟通古今更加行之有效。传统的古文字学习方法以《说文》为基础，把《说文》当作打开古文字之门的钥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合理且行之有效。

当前，古文字材料已经积累到能够通过古文字教材学习古文字了，学习古文字也可以直接从出土文献文本入手，以《说文》为辅助。不一定研读完《说文》才能学习古文字。但是，二者同步进行，不仅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促进思考，彼此发明，还可以更快进入学术探索的阶段。

《说文》在学习古文字中的作用可以适当淡化，但古文字研究不仅绕不开《说文》，还要充分发挥其作用。

四、利用《说文》研究古文字

许慎把他能认识的“古文字”大都收入《说文》，其中一些来源不明的生僻字，大都是古文的篆化，《说文》的解释是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蕴含着解读古文字的信息。我们举《说文》卷三“谷”部的“𠄎”字为例：

“𠄎：舌貌。从谷省。象形。𠄎，古文𠄎。读若三年导服之导。一曰竹上皮。读若沾。一曰读若誓。弼字从此。”

这个字文献中从来未见使用，来源不明，《说文》提供了如下信息：

第一，两种字形：𠄎与古文𠄎。

第二，释义“舌貌”，文献无证。

第三，构形迂曲。“谷”“𠄎”与“舌”之间难以看出任何关联。

第四，给出四种读音，分别是：导（定母幽部）、沾（端母谈部）、誓（禅母月部）、弼（并母物部）。大徐本所附《唐韵》他念切，古音学家归部透母侵部^[6]。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许慎说不清,我们也看不懂。《说文》中“丙”是多次出现的构字部件,见于“夙(𠄎、𠄎)“宿”“席”“弼”等字形中。

“𠄎,早敬也。从卂,持事;虽夕不休,早敬者也。𠄎,古文夙从人、丙;𠄎亦古文夙,从人、丙。宿从此。”

“𠄎:止也。从宀,𠄎声。𠄎,古文夙。”

“席,籍也。《礼》: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饰。从巾,庶省。𠄎,古文席从石省。”

“𠄎,辅也。重也。从弼,丙声。𠄎,弼或如此。𠄎,𠄎并古文弼。”

因为“丙”的构形不明,上述文字的构形都不明。徐锴已经怀疑“弼”字说:“丙,舌也,非声。舌柔而弼刚,以柔从刚,辅弼之意。”由于没有证据,也是臆测之说。总之,如果根据许慎所给出的“丙”字的音义,从“丙”构形的文字都无法合理解释。但另一方面,许慎虽然弄不清楚“丙”是什么,这些字为什么从“丙”,但他客观保存了这些形体,并正确判断为同一个来源,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

把这些字放在古文字视野下观察,学者很快就发现,“丙”是席子的象形^{[7]288-289}。上列《说文》中所有文字的构形都得到合理解释。古文字中的“宿”“弼”“席”都从“丙”:

宿:𠄎(《合》29711)𠄎(窳叔簋《铭图》5207)𠄎(《说文》)

𠄎(《上博二·容成氏》28)——𠄎(《说文》夙之古文)

宿舍是人休息的场所,房子里面人躺在席子上,属于平面构图表意,非常贴切。省略掉“宀”,“𠄎”依旧可以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用作“夙”,是同音假借。

席:𠄎(九年卫鼎《集成》2831)——席(《说文》)

𠄎(曾侯乙墓简58)——𠄎(《说文》古文)

西周“席”字从巾,石声,《说文》古文从“丙”,“石”声,是异体字。曾侯乙墓简的“席”字在《说文》古文上加上意符“竹”,表示材质。

弼:𠄎(番生簋盖《集成》4326)𠄎(《清华简八·邦家之政》8)𠄎(《说文》)

“弼”是古代车上的遮蔽物。王国维认为“弼”字从“丙”“弼”声,“弼与席皆以簟为之,故弼字从丙”^{[7]289}。

《说文》提供了线索,对照古文字,知道“丙”

的本义是席,《说文》中所有从“丙”的文字构形得到合理解释。但是,“席”的种类和同义词很多,除了“席”,还有“筵”“簟”“箒”“第”等,为什么一定是“席(邪母铎部)”?《说文》给出的四个读音,没有一个与之相近。另外,古文字中还有其他“丙”及从“丙”的字。

“丙”:𠄎(《合》33075)𠄎(《合》9575)^①

“坐”与“跪”:𠄎(《合》5357)

“寻”:𠄎(《合》804)𠄎(《合》6406)^②

“寻”象双臂伸开测量“丙”。“寻”是邪母侵部字,学者指出与《说文》的“读若沾”的“丙”相近,很可能“丙”既表音也表意。宾组甲骨的地名用字有“𠄎”(《合》6057反)、“𠄎”(《合》4552),如果能够证明是同一地名会更有说服力,可惜用例太少。

从《说文》给出的语音线索以及中古音和古文字“寻”的构形等线索看,把“丙”释为“簟”是最合理的。

楚卜筮简中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有多种写法,释读经过曲折的过程。有下列三种字形:

𠄎、𠄎、𠄎

掌握有一手材料的滕壬生将“𠄎”释为“息”,将字形“𠄎”与“𠄎”释为“忧”,皆读为忧患之“忧”:

少又(有)息(忧)于𠄎=(躬身)。(《楚系简帛文字编》^{③799})

少又(有)忧(忧)于宫室。(《楚系简帛文字编》^{③664})

又(有)忧(忧)于𠄎=(躬身)与宫室。(望山简75)^④

第2、3种字形后多见于包山楚简,用法与天星观简、望山卜筮简相同。

《说文》页部:“息,愁也。”释读为“忧”,字形有所依据,辞例顺畅,当时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包山简中有下列字形:

少又𠄎于宫室。(《包山简》229)

大𠄎尹公𠄎必。(《包山简》139)

笔者根据这一组字形与古文字“息”字形体有别,不论是“首”还是“页”,无一例作此形,曾经将“𠄎”字上部与“弼”字联系起来,将“𠄎”隶作“𠄎”,读为“拂”。《说文》:“拂,郁也。”^[8]

在《字源》编纂讨论会上,陈剑当面指出存在的问题:即使从“弼”,也是个别写法,绝大多数从“𠄎”。将“𠄎”读为“戚(憾)”,《说文》“憾,

忧也”。“夙”与“宿”是心母觉部字，“戚(憾)”是清母觉部，读音也很近。形音义都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把“𠂔”下加“夕”的“𠂔”理解为“夙”的异体，也能合理解释加“夕”的原因。

至此，楚文字卜筮简中从“𠂔”的字得到了正确的识读和充分的阐释。反思自己犯过的错误，发现了问题，思路也没有出格，为什么结论出了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文》不够熟悉，研究不够深入，没有理清《说文》“𠂔”的形音义，以致使用孤例，铤而走险。这里的教训之一就是，古文字研究需要熟读《说文》。

“𠂔”与“𠂔”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做一个小结。

“𠂔”的初文象簟席形，根据《说文》及其他韵书等给出的语言线索，可能是“簟”的初文。

《说文》中“宿”“夙”之古文、“弼”与“席”之古文中都有“𠂔”形，与事实相符。在知道“𠂔”的本义后，从“𠂔”诸字的构形都能得到合理解释。

“𠂔”是人躺在席子上的表意字，与“宿”是繁简字。

“夙”是早期的表意字，“夙”与“𠂔”读音相同，“𠂔”可以假借作“夙”。

楚简中的“𠂔”是“夙”的后起本字。从夕，𠂔声，夕表示时间。

楚简中从“心”，“𠂔”声或“𠂔”声的“𠂔”，读为“憾”。

古文字中的从“𠂔”的“坐”“寻”等字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阐释。

下列两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𠂔”与“𠂔”这两种字形该如何解释，古文字考释中这样的材料该如何使用。

第二，“休戚相关”中的“戚”，是一种两侧锯齿状的特殊兵器：

戚：𠂔(《合》34287)𠂔(《屯南》^⑤2194)

可以假借表示同音的忧戚的“戚”，例如休戚相关。很早就分化出“戚(憾)”，见于《上博简》：

戚：𠂔(《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甲5)：“𠂔(喜)君之善而不戚，子玉之师之……”

卜筮简中所有读为“戚”的字全部从“𠂔”声，《成王为城濮之行》记载晋事，文本传入楚地的可能性大。这是地域差异还是用途或表意差异，可以进一步思考。

总之，《说文》虽然对“𠂔”“𠂔”的构形阐释都不正确，但留下了重要的线索，对释读古文字大有裨益。

以上通过几个例证来说明《说文》是汉代所识古文字之大全，在当今古文字取得重大突破与全面进步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古文字纠正《说文》之不足，可以利用《说文》中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古文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现当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一直在这两条道路上前进。言之易而行之难，在具体的研究中，一方面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或有偏颇。

我们要立足当今学术前沿，正确认识《说文》的成就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我们要谨防脱离历史条件的评判。《说文》之后文字学发展了近两千年，无论是材料上，还是理论上、方法上都有重大发展，比许慎进步是理所当然的，不能脚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就自我感觉比巨人更高。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对《说文》的过度指责并无太大益处。我们要充分利用大部分正确的内容识读和学习古文字，利用其中有价值的信息解决疑难问题。

此外，我们不能盲目崇古，把糟粕当作精华。必须正视《说文》中的不足。从宏观上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材料缺陷。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对西周文字所知也很有限。二是理论缺陷。《说文》依托的理论是“六书”，有系统性缺陷，依靠这一理论阐释文字构形也会出现系统性错误。三是目的与方法缺陷。许慎创作《说文》不仅仅是解字，也是为了解经，通过文字阐释表达其经学思想。这些不足都是时代条件所致，是时代的不足。正是由于这些宏观的不足，在文字个体的阐释过程中常常是非参半，我们必须仔细甄别。

离开《说文》的古文字研究没有根基，离开古文字的《说文》研究难有出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从具体的文字研究做起，一个钉子一个钉子拔起来，解构《说文》；一个钉子一个钉子砸下去，重构汉字学体系，汉字研究逐渐会形成博采众长、古今融通的新局面。

注释

①汉代的古文文献部分出自壁中书，部分是搜集的民间藏书，与今天出自墓葬、废墟、古井不同。②图1中的《合》指《甲骨文合集》，文中均简称为《合》；《集成》指《殷周金文集成》，文中均简称为《集成》；《包山简》为包山楚简的简称，简文可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下文均简称《包山简》；《马王堆》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文字，可参考刘钊主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中华书局2020年版，文中均简称《马王堆》；③图中《郭店》为郭店楚墓竹简的简称，简文可参考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文中均简称《郭店》；《上博一》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简称，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下文《上博二》《上博九》，分别为该系列（二）（九）的简称；《睡虎地》为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简称，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文中简称为《睡虎地》。④参见李学勤：《从两条〈花东〉卜辞看殷礼》，《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蔡哲茂：《说殷卜辞中的“圭”字》，中国文字学会、河北大学汉字研究中心编：《汉字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15页；裘锡圭：《谈谈编纂古汉语大型辞书时如何对待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说》，《辞书研究》2019年第3期，第2页。⑤《清华简一》指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版；文中《清华简二》《清华简八》等，分别为该套丛书（贰）（捌）的简称。⑥表1中的《花东》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简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文中均简称为《花东》。⑦郭永秉认为“𠄎”字当释“𠄎”，与“𠄎”音近相通。参见郭永秉：《楚竹书字词考释三篇》，《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6页。⑧《里耶秦简》，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里耶秦简（贰）》，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⑨《铭图》为《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的简称，吴镇烽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⑩上文引到的“吉”字形“𠄎”（《合》30061），很可能是由“圭”演变为“士”的过渡字形。参见裘锡圭：《谈谈编纂古汉语大型辞书时如何对待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说》，《辞书研究》2019年第3期，第7页。⑪二字词例不完整，所记录语言不明。⑫参见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146页；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56-59页。⑬参见滕壬生编：《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⑭参见滕壬生：《释𠄎》，《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52页；又见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63-664页。⑮《屯南》为《小屯南地甲骨》的简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51.
 -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3]林沅.林沅文集:文字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03-102.
 - [4]周忠兵.甲骨文中几个从“上(牡)”字的考辨[M]//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中国文字研究:第七辑.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139.
 - [5]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27.
 - [6]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16.
 - [7]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8]李守奎.释楚简中的“𠄎”字:兼释楚玺中的“𠄎”[M]//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15-217.

Shuo Wen Jie Zi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Li Shoukui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study of *Shuo Wen Jie Zi*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ook) is a significant subject nowadays. The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udies in the Han Dynasty, also a founding masterpiece of traditional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fore, it has been fully utilized and studied throughout the Chinese history, exerting its various values in different eras. Each era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knowledge, and in today's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possible to make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Book, and make fuller and wider use of the Book to study and research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First, the Book is a compilation of the so-called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of the Han dynasty, among which th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n the headings of characters other than the contents. Second,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study of the B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 and achieve systematic innovation. These two parts on using the Book to learn and analyz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intende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not just focusing on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Book, but giving full use to its value and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Shuo Wen Jie Zi*;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责任编辑/知 然]